

崛起与辉煌

——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妇女

唐娅辉 著

气象出版社

崛起与辉煌

——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妇女

唐娅辉 著

气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崛起与辉煌: 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妇女/唐娅辉著. —北京: 气象出版社, 2000. 5

ISBN 7-5029-2902-9

I. 崛… II. 唐… III. 妇女工作-中国 IV. D4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6978 号

崛起与辉煌

——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妇女

唐娅辉 著

责任编辑: 张 斌 终审: 纪乃晋

气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 46 号 100081)

湖南长沙气象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0625 字数: 184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一版 2000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5029-2902-9/Z · 0178

定价: 1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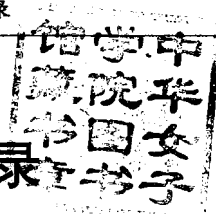
敬請賈院長雅正

陳姓芝

2000.6.20.

目

录



第一章 春江水暖	(1)
一、“左”倾的后遗症	(1)
二、时代的里程碑	(10)
三、显才的大舞台	(19)
第二章 面对挑战	(25)
一、“下岗”的困惑	(25)
二、被拒的公主	(31)
三、“差额”的冲击	(32)
四、家庭的嬗变	(35)
五、人格的裂变	(43)
六、理论的窘迫	(48)
第三章 擎旗指路	(53)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	(53)
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出台	(59)
三、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的实施	(65)
四、妇女权益保障法的颁布	(72)
五、促进妇女参与程度的提高	(77)

第四章 自我复苏	(84)
一、主体意识的发展	(84)
二、竞争意识的增强	(88)
三、成就意识的勃发	(93)
四、角色意识的调整	(97)
五、群体意识的确立	(101)
第五章 励精图治	(106)
一、组织的变革	(106)
二、管理的创新	(117)
三、崛起的丰碑	(129)
第六章 奋力创新	(143)
一、农村妇女的开拓	(143)
二、城镇女性的搏击	(152)
三、女企业家的崛起	(162)
四、政坛女性的丰碑	(169)
第七章 繁花硕果	(176)
一、跨世纪的妇女盛会	(176)
二、迈向新世纪的宣言	(192)
三、崛起与辉煌的 20 年	(200)
第八章 走向未来	(206)
一、改革开放与妇女	(206)
二、妇女与二十一世纪	(213)

第一章 春江水暖

一、“左”倾的后遗症

1976年是个不寻常的龙年。岁末，当龙的传人们送走这个“图腾”崇拜的始祖之后，才惊讶地发现，这一年它给中国带来的灾祸实在是太多，太大、太凶了！

这一年里，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相继逝世；初春吉林下了一场陨石雨；7月煤城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死亡多达几十万人。这个龙年，开始给人们带来的的确是大悲、大痛，然而，大自然并不总是按照某一个特定的方向线性地发展，多灾多难的中国，终于在龙年的金秋10月，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人民欣喜若狂。但十几年的“左”倾给人们留下了苦涩的记忆，同时，也给中国的妇女运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要想深刻地认识因“左”倾带来的后遗症，就必须从以急躁冒进为特征的“大跃进”年代谈起。

——超前的僭越

1957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与此同时，党和国家的某些领导人，在工作指导方针上，出现了“左”的偏差，尤其是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全会上，轻率地改变

“八大”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正确论述,尔后又逐渐提出“三面红旗”,形成“左”倾指导方针,从而导致妇女工作指导方针的失误,影响了妇女的发展。

1958年6月30日至7月28日,全国妇联召开了全国妇女工作会议,讨论党的总路线公布以后,妇女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在“大跃进”形势下妇女工作问题。会议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检查了所谓右倾思想;确定当时妇女运动的总任务是“调动妇女一切积极因素,为贯彻执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而奋斗。”会议认为妇女“三大”提出的“两勤”方针不能体现妇女解放的目标,故放弃了这个方针而开始全力推动妇女工作的“大跃进”。如果说这次会议“左”的妇女工作指导方针基本形成并开始严重影响妇女工作,那么,1958年9月,全国妇联党组《关于全国妇女工作会议情况向中央的报告》,则标志妇女运动中“左”倾指导方针正式并已经开始了妇女运动的“大跃进”。报告从理论上论证了“左”倾指导方针的正确性,认为“人民公社是解放妇女的最好组织形式,它能使全体妇女都成为工人阶级,变成社会劳动者”,能“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把家务劳动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大经济”。同时,它作为发动妇女投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得到了中央的首肯。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时肯定举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集体的社会服务事业,是“正在蓬勃发展的人民公社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方面”,要求各级妇联要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

在“左”倾指导方针的影响下,妇女发展出现了较大的偏差,主要表现在:

第一,不顾国家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妇女生理特点、家务劳动的负担等实际问题,盲目要求妇女一律参加到社会生产中去,使全体妇女都成为工人阶级和社会劳动者。妇女占人口的半数,是一支伟

大的人力资源,离开了妇女,社会车轮将无法运转;物质生产及与之适应的社会活动将萎缩,人类生产将停止。因此,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不仅如此,也是妇女彻底解放的必备条件。妇女只有投身到生产中去,才能在为社会提供财富的同时赢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和主人翁的政治权利。但是,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完全忽视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妇女的特点,动员妇女走出家庭投身社会。在农村,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几乎全部参加了人民公社的各种劳动。据当时统计,1959年农村人民公社妇女出勤人数一般能经常达到妇女劳动力总人数的90%,这一年,男劳力全年出勤300天左右,而女劳力也有250天左右,亦接近男劳力的出勤天数。有些地方连老年妇女和体弱多病、怀孕、生产、哺乳的妇女也走上了劳动第一线。广大农村妇女的劳动内容也由原来主要从事辅助劳动变成和男子一样普遍参加主要劳动。她们既要同男子一道参加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争放“钢铁卫星”,同时又在“女子大办农业”的口号下包揽全部农活,类似“千斤姑娘万斤嫂”的人物层出不穷。妇女劳动强度的增强,严重损害了妇女的身体健康。当时农村妇女患子宫脱垂的约占妇女劳动力的20%以上,患闭经病的更多,在水稻区约占妇女劳动力总数的50—80%。^①在城镇,通过对中外妇女就业情况的简单对比和分析,认为苏联妇女就业的比重是45%,民主德国是41.7,美国是29.3%,英国是34.7%,日本是29.5%,而中国才是14%,就业比重太低,因此断定,发动城镇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的人数越多越好,规模越大越好,速度越快越好,尽快使中国妇女的就业率名列世界前茅。为此,动员大量城镇妇女投身各行各业,妇女就业率急剧上升。

^① 罗琼:《关于贯彻以生产为中心的妇女工作方针的问题》,《妇女工作》1980年第9期。

1958 年在职工队伍由 1957 年的 328.6 万猛升到 810.8 万,增加了 113%。许多缺乏生产设施和技术人员的“妇女炼钢厂”、“妇女采矿队”、“三八炼焦厂”等也在“妇女什么也能干,什么也干得好”的口号下应运而生。这种忽视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妇女生理特点,盲目提高妇女就业率的作法,不仅增加了社会的困难,而且影响了妇女解放的进程。

第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强调“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由于要求妇女一律参加生产劳动,因而造成了社会劳动与家务劳动的矛盾日益尖锐。为了解决这对矛盾,就“必须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这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条件。但是,它不是靠政治运动和大规模的宣传能实现的,而是在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1958 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刚刚恢复,人民在吃、穿、用等方面还未完全达到温饱水平,部分地区还相当贫困,根本不可能拿出太多的资金来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即使到了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的今天,也没能完全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而当时则提出“把更繁重的、琐碎的,使人愚昧的家务劳动改造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事业”,“由组织主要家庭生活向全面组织集体生活发展”,“使集体生活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生活方式”^①。因此,在城乡大搞“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家务劳动社会化”,“儿童教育以社会教育为主”。1959 年,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数,农村有四亿,到 1960 年 3 月底止,全国 168 座城市统计,在食堂吃饭的人数有五百余万。^② 城市入托幼儿园的婴幼儿,1958 年比 1957 年分别增长 37 倍和 26 倍。有些地方创造了所谓以公共食堂、托儿组为基础的综合性的集体生活和社会服务组织,认为“越是集体化,饭菜花样越多,越能满足人们的各种

① 《新华半月刊》1960 年第 6 期。

② 《中国妇女》1960 年第 7 期。

不同需要”。然而，客观的经济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一轰而起的公共食堂、托幼儿园所相继垮掉，如安徽的公共食堂刚建立不久就跨掉 30%，幼儿园垮了 50%，到 1960 年，全国各地在短期内仓促办起的公共食堂和托幼儿园所，大部分自行解散。

第三，错误地认为“我国妇女运动进入彻底解放妇女的新阶段”。《中国妇女》1958 年第 10 期刊登了题为《论妇女运动的新阶段》专论，认为“人民公社的道路，就是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巩固，使我国妇女运动进入彻底解放妇女的新阶段”。理论来源于实践，错误的理论来源于对实践的错误评估。专论认为，“1958 年全国广大妇女最普遍最广泛地参加了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建设，绝大多数妇女成为社会劳动者”，同时“迅速地普遍地实现了家务劳动社会化”，实现妇女解放的重要标志和重要条件都已成为现实，“因而使妇女解放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被视为能使妇女走上彻底解放道路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一轰而起，到 1958 年 9 月底，全国实现公社化，原来 75 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 23397 个人民公社。在公社化运动中，许多方面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严重地挫伤了劳动妇女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能力。在人民公社迅速发展时，全国妇联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县和县以下妇联组织存废问题的报告》，认为“在人民公社办好后，在妇女解放的历史使命全部完成之后，妇女组织必然要自行消亡，这是肯定的，现在看已经为时不远”。这样，就给基层妇联组织带来了混乱，不少地方自动取消，有的则并入其他部门，大大削弱了妇女运动的领导力量。事实说明，妇联组织存在与取消问题，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是根据妇女解放运动的任务、妇女解放的程度，妇女问题的有无为依据的。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

要经过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有妇女问题存在,就要开展妇女运动,就要有单独的妇女组织存在,以便领导和推动妇女运动向前发展。

妇女运动“左”倾指导方针的产生及造成的危害,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客观上受党中央“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妇联作为党联系妇女的桥梁和纽带,理所当然地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为实现党的总任务而奋斗。当党中央错误地作出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策时,妇联必须领导广大妇女积极响应,贯彻执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妇女运动“左”倾指导方针的产生是必然的。

其二,全国妇联对领导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在民主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妇女参加革命战争,努力支援前线;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是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妇女运动的任务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过去那套熟悉的、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的方法已经不适应新的情况,究竟怎样来领导妇女参加这场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不出现失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从错误中得到锻炼,积累经验。

其三,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时,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这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但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违反了这一条基本原理。不顾当时生产力水平低、群众觉悟程度不高的现状以及妇女自身的生理特点,盲目地片面地急于变革生产关系。把建成人民公社看成是妇女彻底解放的新阶段,把“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家务劳动

社会化”，看成是解放妇女的必要措施。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使生产关系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挫伤了妇女的生产积极性。

由于党在工作中指导方针的严重失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面对挫折，党及时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号召全党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对纠正“左”倾错误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它的正确方针和精神未能彻底贯彻下去，随后发生的“四清”运动，使“左”倾错误加剧，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妇女发展事业因此也受到更严重的影响。

在男女平等问题上，忽视男女生理差别，片面强调“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照样能办到”。一时间，“娘子军开山连”、“红大娘战斗队”、“铁姑娘采石队”、“三八妇女架桥队”、“三八女子带电作业班”、“女子打井队”……层出不穷。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许多妇女从事野外、高空、高温等劳动强度大的工作，而妇女劳动保护制度却荡然无存，严重地损害了妇女的身心健康。与此同时，妇女的天性遭到人为的扭曲。在文学作品中，在舞台和银幕上的女性，都被塑造成浓眉大眼，没有七情六欲，只谈革命不谈爱情，只爱武装不爱红装的男性化女人。各种体现妇女风格的服饰、发型统统被斥为“封资修”而受到批判。

这一切超越现实的做法，既增加了拨乱反正的难度，也严重阻碍了女性的发展。

——潜在的劣势

实事求是地考察当代世界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我们不无自豪地看到，尽管中国社会经济还比较落后，中国妇女的解放程度却佼佼于世界妇女之林。她们的政治权利、社会待遇、就业状

况和家庭地位,是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妇女所无法企及的。较之中国妇女过去的情况,我们也惊喜地发现,中国妇女的社会生活有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惊人进步。她们从被奴役、被压迫、受歧视、愚昧落后的状态,一跃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人,当仁不让地跨进了世界妇女解放的前列。中国妇女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中国妇女的命运是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联在一起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妇女解放。

然而,与中国妇女解放程度不太协调的,却是中国妇女自身的素质问题。

一个人的基本素质主要是由社会化的文明程度决定的,它不仅表现为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认识,也表现在人对社会生活的反应和驾驭能力上。中国妇女整体素质偏低主要是指文化科学素质和心理素质偏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历史的因素,它根植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残酷奴役,严重地束缚了女性能力的发挥;也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保护政策所为。

首先,自上而下的整体性保护政策,导致女性主体意识差,依赖性强的。

妇女自主权的一个重要含义是,不应将妇女仅仅看作是对象,而应视她们为主体。而旧中国被捆绑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下的中国广大妇女连争平等、求解放的意识也几被扼杀殆尽。这样一来,中国妇女自然难以靠自身的力量完成翻身求解放的重任。展现在以改造社会、解民于倒悬为已任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中国妇女,首先是一个受苦受难的群体,是急待拯救的对象,这就不难理解党和人民政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妇女解放采取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整体性保护政策。就大部分妇女而言,在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为被动的角色。几十年的文化变迁和社会进步的积累

与演进,妇女解放运动实践的深入发展,为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提供了较为成熟的条件,我们的保护政策自然也应该把促进女性个体自觉解放作为侧重点。几十年来,中国妇女的主体意识虽然有了大发展,但在妇女各阶层中又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城市和乡村、沿海和内地、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知识妇女和非知识妇女等等,独立意识相去甚远。如果说,缺乏妇女解放的客观社会条件,是旧中国女性整体的不幸,那么,自我意识的迷乱则是当今部分女性个体的悲哀。

其次,直接包揽的全面性保护,导致女性竞争意识弱。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对女性就业,参政诸方面的保护政策常常表现为确保女性充任社会角色的比例,而忽视了女性竞争能力的提高,使女性缺乏竞争意识。当竞争机制引入到社会生活时,女性感到无所适从,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穿着打扮上敢于标新立异,在社会竞争面前却束手无策”。

再次,推上社会的直接性保护,使女性忽视了自身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的提高。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为了确保女性充任社会角色,采取了直接的保护政策,即任何单位、个人都不得拒绝女性就业、参政等,但在帮助妇女提高文化知识水平方面措施不力。据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妇女中文盲的比例高达30%,经济相对发达的广东,全省文盲总数中妇女占80.4%。如此的文化素质,势必难以适应社会改革的要求,因此随后出现的女工下岗、参政比例低等都是应有之义。

粉碎了“四人帮”,为中国妇女运动走向新时代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人们在欢庆之余,仍然心有余悸,极“左”的一页是否真的揭过去了?“左”倾的后遗症能否治好?这既是疑虑、祝愿,更是企盼。

二、时代的里程碑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真正开始了全面而又彻底的拨乱反正，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它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同样也对于妇女解放运动具有划时代里程碑的深远意义。

具体而言，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妇女运动的深远意义就在于：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妇女工作徘徊前进、步履艰难的局面。

从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妇女工作处在徘徊前进的过程中。一方面，全国妇联发动各族各界妇女积极投入揭批“四人帮”破坏妇女运动的斗争，为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努力；初步恢复受“四人帮”干扰破坏而瘫痪的基层妇联组织及其工作，筹备召开了全国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就是全国各族妇女的崇高任务”。另一方面，反映在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上还没有拨乱反正。体现在“四大”在确定新时期妇女运动的总任务时，其基础就是坚持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论依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体现在对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还停留在“左”的水平上，仍然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视为主要问题；^①体现在实际工作中，形式主义严重，如忽视妇女的生理特

^① 《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78年9月9日。

点要求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妇女投入到“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去,有些地方甚至提出妇女的出勤率要达到100%,达不到的要开会批判。

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时间里,中国的妇女运动这艘航船就是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中似进似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摆正了多年来一直摇摆不停的妇运航船,从此,中国的妇女运动不再徘徊,中国妇女运动的领导者也不再犹豫,中国的妇女也不再徬徨,她们在如何进一步推动妇女解放的问题上,以改革开放为契机进行新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它促使妇联组织解决了近20年来一直力图加以解决而没有解决好的妇女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早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左”倾错误造成的妇女运动中的许多混乱现象,使全国妇联逐渐有所觉察,并及时采取积极步骤,力图领导全国妇女纠正工作中的错误。

1958年12月3日至16日,全国妇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参加会议的代表2500多人,她们都是来自全国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会议根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不照顾妇女特殊利益的问题,特别强调要注意妇女群众的劳逸结合,关心妇女儿童健康问题,并将这些问题作为党交给与会代表的一个任务,切实执行。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在1959年纪念“三八”节的会议上明确指出:“在托儿所、幼儿园方面,要根据生产发展和群众需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采用灵活的组织形式。”《中国妇女》也在1959年第三期刊登了全国妇联副主席李德全《关心妇女健康,保持旺盛干劲》的文章,指出保护妇女劳动力,要从“改革劳动工具,提高生产技术,减轻妇女劳动强度”和“合理安排好妇女劳动力,重视保护妇女的健康”两方面入